

从理想模型到建筑方案： 边沁的两版全景监狱设计图研究 *

From Ideal Model to Architectural Plan: A Study of Two Versions of
Bentham's Panopticon Design

马佳志

MA Jiazhi

摘要：基于边沁 1787 年、1791 年设计的两版全景监狱设计图，结合边沁的书信文稿与英国监狱改革的历史背景，通过比较研究，分析全景监狱的设计过程及设计思想。指出初版方案呈现了边沁的理想构思，是对监视原理与权力关系的空间化，适用于监狱和其他建筑类型。新版方案则是妥协的结果，在政府、社会的影响下背离了监视原则。然而，边沁的立场并未动摇，他对部分原则性话题避而不谈，甚至在图纸中隐藏了改动。本文强调建筑图像在表达设计思想和演变中的复杂性，突出将建筑图纸置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必要性，深化了对图像与思想之间复杂联系的理解。

关键词：全景监狱；边沁；建筑图纸；建筑思想

Abstract: Based on the two schemes of the Panopticon prison program, released in 1787 and 1791, in combination of an examination of Bentham's epistolary corpus and the historical backdrop of British prison reform,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design evolution and conceptual underpinnings of the Panopticon through a comparative lens. The first version showcases Bentham's utopian vision that articulates the spatialization of surveillance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power relation. The subsequent version emerges as a compromise, one that yields to external pressures from government and society, deviating away from the cardinal principle of surveillance. Despite these concessions, Bentham's core stance remains steadfast, evidenced by his subtle evasion of certain ideological pillars and even the concealment of alterations within the drawings. This paper underscores the intricacies of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conveying design philosophy and its evolution, emphasizing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interpreting architectural drawings within their specific socio-cultural milieu. It further fosters a deeper appreciation for the intricate interplay between visual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ideas they encapsulate.

Keywords: Panopticon; Bentham; architectural drawings; architectural ideas

【文章编号】2096-9368 (2024) 04-0101-08

【中图分类号】TU-091

【文献标识码】A

【录用日期】2024-09-24

【作者简介】

马佳志，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选
[2023]49 号

1787年,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了全景监狱的构想,建筑中心的检察室可监视全部犯人,犯人单独拘禁在牢房内起居、工作。1791年的新方案又进行了大幅修改,尽管在图纸上维持了圆形轮廓与环状布局,但在教堂、囚室的设计上存在显著差异,甚至抛弃了检察室这一监视全监的空间,丧失了全景监视机制。

在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分析的影响下,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权力关系、监视机制与惩罚理论,并同福柯一道未加区分地将两版方案视为统一的整体,忽视了设计图纸上的重大转变。福柯《规训与惩罚》开创的对全景监狱中规训机制的讨论,将全景监狱视为一种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隐喻,权力不仅通过暴力和强制来实现,而且通过监视和知识生产来规训个体。^[1] 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认为全景监狱体现了一种“全面性的逻辑”,即通过对个人的全面监控和规训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并同中国法家思想相类比。^[2] 朱建飞在福柯与于连的基础上,探讨了全景监狱模式在明清北京城中的体现,指出全景监狱与北京城都是“现代的”、理性的、严格的权力中央化的空间构造。^[3] 作为研究全景监狱的唯一专著《边沁的监狱:全景监狱研究》(*Bentham's Prison: A Study of the Panopticon Penitentiary*)虽区分了两版方案,但作者珍妮特·森普尔(Janet Semple)的研究并未涉及空间层面,而是基于书信手稿等新史料,着重讲述边沁为推动全景监狱付诸实践与政客们的交涉,并延续了福柯对权力的讨论。^[4]

作为建筑学领域关于全景监狱的研究典范,罗宾·埃文斯(Robin Evans)与菲利普·斯特德曼(Philip Steadman)的讨论均涉及两版方案。埃文斯更关注光线与声音控制、隔离与忏悔结构、环境控制技术,忽视了边沁文本同图纸间的矛盾与落差,基于边沁理想化的描述将新方案简化为旧方案的延续,将其视为一种获得权力方式的“成熟方案”。^[5] 斯特德曼着重分析了两版方案的设计差异,认为取消了检察室的新方案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全景监狱,通过与本顿维尔监狱(Pentonville Prison)的比较指出狱警的安全隐患、空间的浪费等内在问题。^[6] 但斯特德曼未对方案变化作出解释,也未考察边沁思想、立场与设计图之间的关系。

本文基于上述既有研究,通过比较两版全景监狱设计图,结合边沁的书信文稿和以改革家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为代表的主流刑罚思想,指出两版方案的差异源自“理想模型”与“建筑方案”的不同身份,以及政府、社会和主流观念的影响。但边沁的立场并未动摇,他对部分原则性话题避而不谈,甚至在图纸中隐藏了改动。

1 1787年方案:将权力机制空间化的普适模型

边沁出生于1748年的伦敦,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便一直从事法律行业,并担任林肯律师学院高级委员(Bencher of Lincoln's Inn)。18世纪70年代,他开始对法律职业失

望,认为法律制度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律师的利益与其客户和公众的利益直接对立。1779年的《感化院法案》(*Penitentiary Act*)激起了他对监狱的兴趣,他对法案颁布前的草案大加赞赏并提出诸多建议,但这些建议大多石沉大海。^{[4]46-48} 直到边沁从弟弟塞缪尔·边沁(Samuel Bentham)那里获得了灵感,二人开始筹划一种新的监狱建筑。

关于全景监狱的概念起源,边沁毫不避讳地表明这来自工程师弟弟塞缪尔。作为一名前英国海军的工程师造船师,塞缪尔于1780年前往欧洲大陆考察后移居俄罗斯,为海军建造船只并训练水手和工匠。这些工人既缺乏纪律也不够勤奋,管理者急需一种更好的培训与监督方案,这或许是全景监狱的最初构思——一座新型工厂。^[7] 1785年,边沁在探望塞缪尔时,发现这一建筑构思十分契合他的治狱思想。同时,《感化院法案》所计划的两所国家监狱一直未能建成,边沁便开始着手完善新监狱的构思,尝试说服英国政府实现他的宏伟计划,即全景监狱。

据边沁的描述,这座圆形建筑分为三个部分:外侧的牢房(Cell),中心的检察室(Inspector's Lodge),以及二者间的环形区域(the Intermediate or Annular Area)。牢房区域共有四层,每层48间囚室,囚室间的隔墙沿着直径延伸至检察室。囚室外侧设置大窗,内侧为铁质格栅。每两层牢房为一个单元,下层牢房的进深更大,相差部分为穿越囚室间延伸隔墙的上层走廊。环形区域并不是上下贯通的,每两层囚室设一层楼板及连接上下层牢房的楼梯。中心的圆形检察室共有两层,是检察员的工作与居住场所,检察室的地面比牢房高出4.5英尺,这样每个检察室可以监视两层牢房。^{[8]5-19} 福柯称这些牢房为笼子、小舞台,其中每个“演员”都是独立的、可见的^{[1]224},囚犯被单独监禁且被随时监视(图1,图2)。

全景监狱实行的是“绝对监禁”,犯人任何时候都被监禁在单人囚室内,同检察室一样,囚室是工作与居住场所。囚室间的隔墙被延伸至铁栅外几英尺,监狱内也完全禁止交谈,以阻断犯人间任何形式的交流。为了满足功能要求,囚室内均设置自来水管与污水管。边沁认为相比于狱警运送必需品与污物,机械装置不仅更便宜,而且更加清洁,能够避免污物引起的疾病传播。床也被设计为可翻转且能固定在墙面,以便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劳役。^{[8]5-12}

对犯人的全方位监控,分解了“观看”与“被观看”的统一机制,并囊括视觉与听觉两个层面。监狱的采光全部来自牢房的外窗,阳光通过外窗照亮牢房并传递至检察室,由此犯人无法看到检察室内的情况。检察室的每个窗户外都设有小灯,通过反射镜可将光线引导至牢房,由此单向的视看关系从白天延长至夜晚。为了确保这种单向性,边沁还在检察室窗户上安装百叶、沿着圆形平面直径方向在检察室内设置两片垂直的轻质隔板,以防囚室的光线穿越检察室透射至对侧。对犯人的监听依靠“锡制声筒”系统,每间囚室均设有一个单独的管道,通往并汇总于检察室。“通过这种工具,一个人的低声细语也会被听到,尤其是将耳朵附在声筒上时。”借助声筒,检察员还可以远距离

图1 1787年全景监狱方案立剖面图、平面图
[伦敦大学学院边沁项目 - 转录边沁 (UCL Bentham Project- Transcribe Bentham), 编号 JB119/125/001、JB119/126/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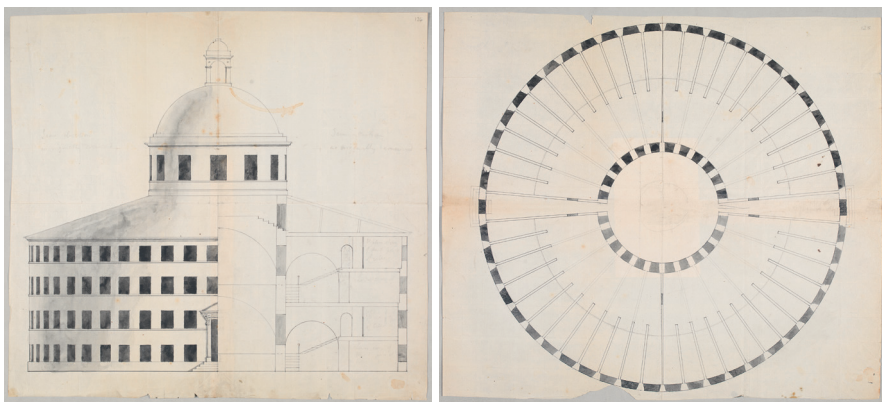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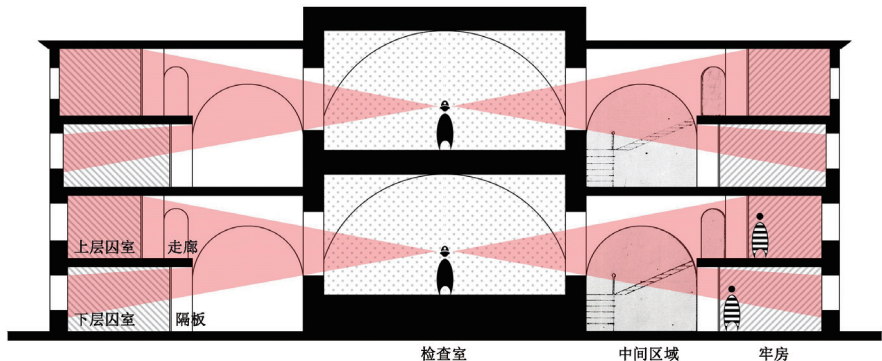


图2 1787年全景监狱方案示意图
(作者自绘)



对犯人下达指令，也避免了其他犯人察觉到这些谈话。^{[8]8②}

基于边沁所设想的监视机制，全景监狱可以凭借最小的成本，实现对大量犯人的管控。对于管理者，身处这座“看而不被看”的装置中，便可以悄无声息地掌握全部犯人的即时动态。边沁甚至希望在支付一份工资的情况下，让检察员所有家庭成员在此居住生活，因为“在与外界隔离的环境中，他们都会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监视的方向……一个有限但有趣且多样的场景”。^{[8]23-24} 对于犯人而言，他们始终感觉自己正在被监控检查，检察员仿佛无处不在。甚至可以通过顶部增设连廊，将数个全景监狱相连，由一个检察员负责多个监狱。即使检察员不在场，也会有隐形的权力约束着犯人的行为。

在全景监狱中，监控的来源不再是检察员，而是建筑本身。埃文斯称其为“反功能性的”，即不再“服务于或回应于使用者……全景监狱影响着使用者，而不是受使用者的影响”。^[9] 福柯从权力角度，将全景监狱视为一种特殊机制，它使权力从个人转移至对身体、人的可见性、光线、目光的分配上，这种分配的内在机制能够制约每个人。^{[1]226-227} 建筑从作为物质空间的场所，转变为一台释放权力的机器：权力的来源不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建筑的运作机制，视线、光线是其权力行使的既定路径。基于此种原理的全景监狱，即对权力机制的空间化。

同时，边沁从未将这种机制局限于监狱，而将其视为一种普适性原则。一方面，这种构思本就源于工厂，被边沁转移应用于监狱。另一方面，边沁始终强调“它适用于

所有能在建筑空间中运转的机构，在机构中的人能够被监督审查。无论其目的有多不同，甚至相反……如：死囚监狱、看守所、感化院、教养院、劳工收容所、工厂、医院、学校”。^{[8]2-3} 因此，初版方案就是将权力机制空间化的普适模型。

2 1791年方案：全景监视的消失

1787年前后，边沁将全景监狱的设计稿从俄罗斯寄往伦敦，以期该计划能得到广泛传播，尽管得到了些许赞誉但始终未能落实。1788年回到伦敦后，他将全景监狱计划暂时搁置了，转向编写法典并陆续出版了关于立法原则、当局政策的书籍。直到1790年，全景监狱计划得到了爱尔兰财政大臣约翰·帕内尔（John Parnell）的肯定，边沁重新将其视为实现抱负的工具。他最初并不想负责监狱建设或日常事务，而是更享受构想计划的过程。最终在1791年初，边沁致信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决心担任国家监狱的承建官（contractor-governor），并在塞缪尔与建筑师威利·雷弗利（Willey Reveley）的协助下完成了第二版方案。^{[4]95-110}

从图纸来看，整个建筑为嵌套在一起的两座塔楼，塔楼间为环形井（annular well）。外部塔楼仍为牢房区域，从四层增至六层，将每两间单人囚室合为一间多人囚室；所有囚室进深均相同，每层均有一条窄走廊；七层为水箱与杂物间。环形区域被改为上下贯通的环形井，顶部为采光

① 根据边沁的描述，牢房的窗户应与房间尺寸相同，以获得最大的采光，与图纸略有出入。

② 本文所有来源为外文文献的引文为作者自译。

通风的开敞天窗。内部塔楼分为上下两部分：检察室被压缩至下部，仅作为休息室与接待室；上部增设礼拜堂，四周环绕两层阶梯楼座。内部塔楼的中心为中央井，上下贯通以满足采光通风；外侧环绕三条环形检察廊（inspection-galleries），取代了检察室的监视任务，每条检察廊可监视两层牢房并与之错层布置（图3）。

奇怪的是，边沁在其著作《全景监狱：后记》（*Panopticon: Postscript*，以下称《后记》）中对新方案的描述与解释，同图纸有很大出入。由于“礼拜堂占据了大部分内部塔楼……无法容纳所有需要住宿的人”^{[10]43-50}，边沁在牢房区域增设了“死角区域（dead part）”，进深被延长至突出立面20英尺，以免开间过大挤压侵占牢房空间。此外，为了尽量减小对犯人的干扰，边沁取消了环绕整个环形井的飞梯，而是集中布置在“死角区域”前。并在检察室下方设置一条通往院子的地下通道，取代旧方案中占据牢房的出入口（图4）。《后记》与伦敦大学学院的图纸，均未体现上述变化（图3，图5）。

新方案中对犯人的观察从检察室转移到三个环形检察廊，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全景监视原理。在旧方案中，不仅

犯人们感觉自己随时被监视，而且这种即时全景监视能够在检察室里实现。在新方案中，没有一个位置或房间能够同时看到所有囚室，在不增加狱卒的情况下无法全景监视，只能在检察廊中不断地巡视。检察廊还增加了被发现的风险。尽管同样利用光线制造视差，并将检察廊内部全部漆黑，但不论从下方陡峭的梯子还是侧面的普通门^①，都很难不被察觉地进出检察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不是全景监狱了（图6）。

边沁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权宜之计”^{[10]67}，用“检察灯笼”（图7）来替代雷弗利设计的检察廊，尝试重新“占据”中央位置，但它仍无法彻底复现监视原理。检察员无法不被发现地进出灯笼，发现情况后无法隐秘地发出警告或通知同事，教堂的存在注定会阻碍观察部分囚室的视线。即使采用了“检察灯笼”，它也只是更接近对监视原理的形式还原，难以形成机制的复现。

较于初版方案，新方案作为建设、运营主导的建筑方案，采用更复杂的空间结构并容纳了更多功能，却丢失了全景监视原理这一核心。教堂的设立、单人囚室改为多人，均与旧方案的立场相左。作为思想表达的媒介，设计图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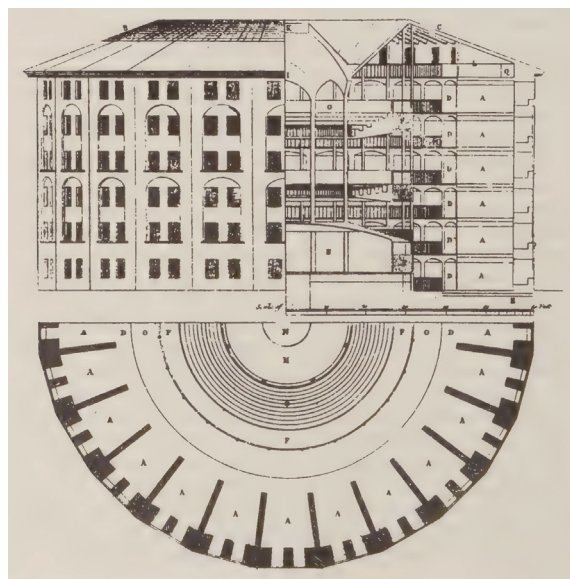


图3 1791年全景监狱方案图纸
(Bentham J, *Panopticon: Postscript Part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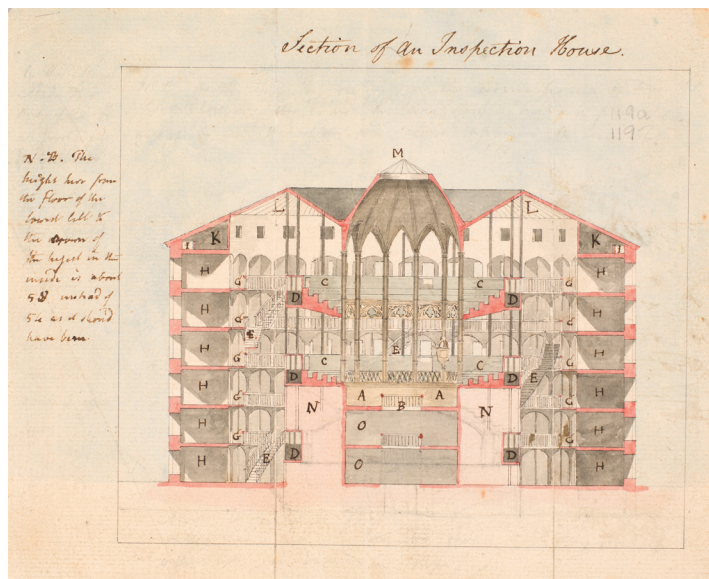


图5 1791年全景监狱方案剖面图
(伦敦大学学院边沁项目 - 转录边沁, 编号 JB 119/119/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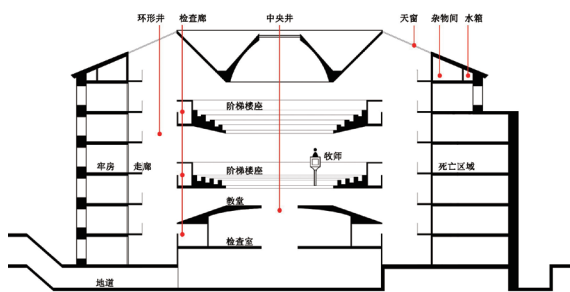


图4 1791年全景监狱方案示意图
(作者基于边沁《全景监狱：后记》描述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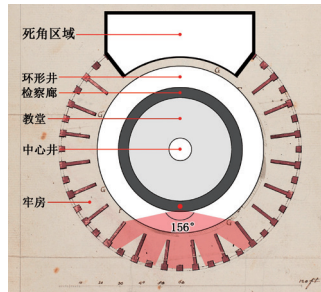


图6 检察视线分析图^②
(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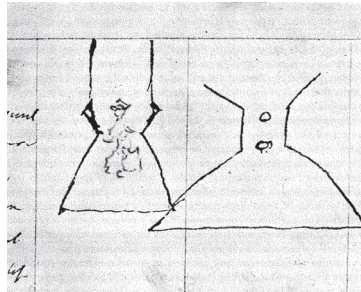


图7 “检察灯笼”草图
(Evans R, *The Fabrication of Virtue*)

① 据边沁在《后记》中的设想，三个检察廊间设有竖向爬梯，检察廊侧面开门通过天桥与囚室侧走廊连接，但在所有图纸中均未体现。

② 在加入死角区域的情况下，按照水平视角156°计算，新方案两层检察廊需要4名狱卒才能完全监视；即使考虑身体旋转形成的360°视角，仍需至少2名狱卒。

教育等较小的代价防止损害、避免私刑与恶劣的环境等方面，边沁与霍华德秉持着相似的立场。^{[13]175, 222-242}

尽管二者在惩罚、教育、卫生环境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具体操作与出发点有着显著差异。就监禁而言，虽然他们都赞同单独监禁，霍华德倾向夜间单独监禁，边沁推崇全天候的“绝对监禁”。单独监禁目的也完全不同，霍华德立足于中世纪的宗教传统，希望通过单独监禁促进犯人反思，避免犯人间暴力冲突与恶习传播；边沁出于安全管理考量，认为单独监禁可以更彻底地审查犯人，完全阻断犯人间交流以防越狱、暴动，他认为“每个监狱都应该被设计成安全的羁押与劳动场所”。^{[8]34}简单来说，囚犯在霍华德的牢房中可以独自反思、忏悔自己的罪行，在边沁的牢房里只有工作。正是以霍华德为代表的主流刑罚思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版方案的差异。

4 从理想模型到建筑方案：图纸下隐藏的思想

对边沁思想的考察需要从方案的变化入手，主要体现在教堂、囚室、死角区域，思想上对应宗教感化、单独监禁、安全结构立场。在此之前应当明确一个前提，即两版方案在性质上的差异：旧方案作为书信与出版物，是边沁的自由创作，旨在宣传新的思想理念；新方案是以建成为目的的建筑方案，边沁作为承建商投入大量金钱与精力，同政府展开了20余年的游说与交涉，受到更多制约。正是两版方案性质、边沁身份的差异引发了设计的变化。

4.1 教堂

教堂的介入是新旧方案立场的最显著冲突，即对宗教感化从否定转为接纳，但边沁始终将劳动视为改造犯人的首要方式。以霍华德为代表的社会主流观点，秉持着对罪犯身体与灵魂的同情与关怀，反映在对卫生与教堂的强调上。他们认为惩罚的首要目的是灵魂改造，宗教感化必须始终优先于劳动生产。^{[3]76}相反，边沁坚持将工作作为衡量改造的标准。他不相信对灵魂与道德的感性判断，坚持通过工作这种绝对理性的标准来评价改造的有效性：“我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判断人的性情……我不知道有什么检验改造的标准能像他们工作量和在工作价值的提高这样简单或肯定。”^{[8]55}

从建筑上看，教堂的设计似乎并不专门用于犯人的宗教感化。环绕的两层阶梯楼座供参观人员使用，犯人们只能在囚室内做礼拜。此外，由于检察廊的遮挡，并不是所有犯人都能看到牧师的位置，只有特定楼层和区域的囚室才有较好的视野（图9）。这种矛盾导致宗教感化难以顺利实施，教堂的象征性和宣传性远大于实用性。

边沁在《后记》中详细阐释了新方案中监狱各个功能和变化，教堂一节却寥寥几笔，讨论的内容也有意避重就轻。他主要讲解了教堂的布局与视线设计，对宗教感化只字未提。对于将教堂安置在中心位置这一重大改变，仅解释为“如果将中央空间填满，会阻挡视线和声音”^{[10]52}。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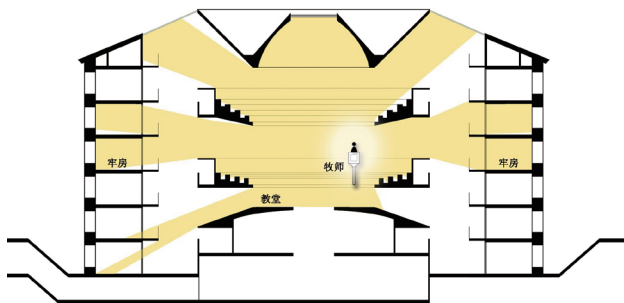


图9 教堂礼拜视线示意图
(作者自绘)

实上正因该变化，监狱丧失了一个能够监视所有囚室的位置，导致全景监狱名存实亡。与之相反，边沁对劳役展开详尽的构想，包括劳动的种类、时间、环境等，甚至引用了经济学理论来追求效率与利润。他认为“在不损害健康的前提下，要从每个人身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工作量”^{[15]96}，形成的利润能够满足监狱开销而不再需要政府拨款，延续了旧方案的立场。边沁毫不掩饰对劳役的追求，却有意对宗教感化避而不谈。即使教堂在空间上占据了核心的位置，他也未能解释设计的合理性、拒绝承认其在监狱中的重要性，教堂更像是一个迫于政府或社会压力而加入的元素。

4.2 双人囚室

在新方案公布前，同为单独监禁倡导者的霍华德就已改变立场。在对犯人观察调研后，他认为长时间的单独监禁是危险且不人道的：“我希望所有囚犯都有单独的房间；因为数小时的思考与反省是必要的……这种惩罚对心灵的净化是迅速的，恐惧使罪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但长此以往，这种净化可能会消失，继而罪犯变得麻木。”^{[16]169}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霍华德仍被视为单独监禁的开创者而遭受口诛笔伐，不难想象当时社会上反对意见之强烈。

虽然新方案转向了双人囚室，同样抛弃了单独监禁，边沁却又毫不留情地讥讽了霍华德的观点。“霍华德认为两三天的独处比长时间更好，那么为什么还要斥巨资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监狱）机构来满足如此短暂的需求呢？……让空虚的心智成年累月地自我摧残，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吗？”^{[10]24, 32}他将囚室人数变化归结为经济与劳役因素，即有利于节约建筑成本与空间、展开多人协作类的工作（图10）。要求从年龄、性格、能力等方面对犯人仔细分类，每间囚室人数不得超过四人，并仍旧施行禁止离开囚室的“绝对监禁”。边沁些许自负地表示，基于上述原则与监视原理的高效力，多人囚室同样能够达到单人囚室的效果，即消除社交引发的恶习传播和越狱。^{[10]21-42}

在单独监禁的问题上，边沁对犯人鲜有霍华德那样的人文关怀，因为他们追求的分别是社会与犯人的利益。霍华德将罪犯视为享有基本权力的人，其思想基于对监狱、罪犯的长期走访调查，目的是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而边沁将犯人视为劳动力，应弥补其罪行所造成的社会损失，试图通过改变法律环境，避免犯人因私刑泛滥或环境恶劣遭受不必要的

伤害，从而保障国家与社会的最大利益。尽管对多人囚室解释并不充分，但边沁支持单独监禁的立场未曾改变。

4.3 死角区域

增设“死角区域”，从建筑设计角度看是合理且有必要的。一方面如边沁所言，容纳管理、宗教、医疗人员住宿，顶部平屋顶用作休憩露台，对外的位置也便于访客进出与后勤补给。^{[10]43-50} 另一方面，“死角区域”连同地下通道解决了旧方案的安全缺陷，即管理人员是被囚犯包围的，一旦发生劫狱或暴乱，他们将完全暴露在危险中，如同 1780 年暴民闯入纽盖特监狱（Newgate Prison）出现的状况。

或许这并非边沁的本意，但“死角区域”的加入形成了新的权力结构，并将权力转移至监狱外。斯特德曼认为“死角区域”的命名，缘于“它没有通往内部的窗户”，可被理解为“盲区”或“死角”。^[6] 这时，典狱长无法观察囚室的情况，他的权力范围被限定于狱卒与检察室，行使权力的方式为下达指令，或通过地道对检察室进行突袭检察，形成了“典狱长—狱卒—囚犯”三层单向的权力结构。正是由于无法直接监视监狱内部，“死角区域”被隔离在监狱

与监视系统之外，而监狱的最高权力也从建筑的几何中心转移至外部。埃文斯认为“监狱设计的历史就是将权力从监狱内工作生活的人，转移到监狱外的统治者的历史，以及建筑在这种侵占中所扮演的不被注意的角色”。^{[5]46} “死角区域”是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重要锚点，中世纪狱卒的绝对权力逐渐被剥夺并沦为被监管的对象，建筑及监狱外的统治者成为享有监狱权力的主体。

新方案的三份图纸均隐藏了“死角区域”，将平面虚假地绘制为旧方案的圆形，很大程度上是对监视原理的隐喻。文字描述的平面更复杂、具体，更像是功能或环境影响的呈现。但就图像呈现效果而言，圆形作为简单纯粹的几何形式，更易表达思想理念，能够直观、抽象地反映监视原理及其普适性（图 11，图 12）。在边沁的写作中，也体现了相同的意图。如前所述“检察灯笼”的构想，同样是对监视原理在形式上的还原，却不满足隐蔽出入等其他要求。此外，不论在《后记》还是写给首相的信中，边沁都在宣传监视原理的普适性，希望着手“将监狱改造成学校”。^{[17]227} 因此，“死角区域”的隐藏体现了边沁对旧方案这一理想模型的追求，目的就是从形式上还原监视原理，便于人们直观地理解、应用与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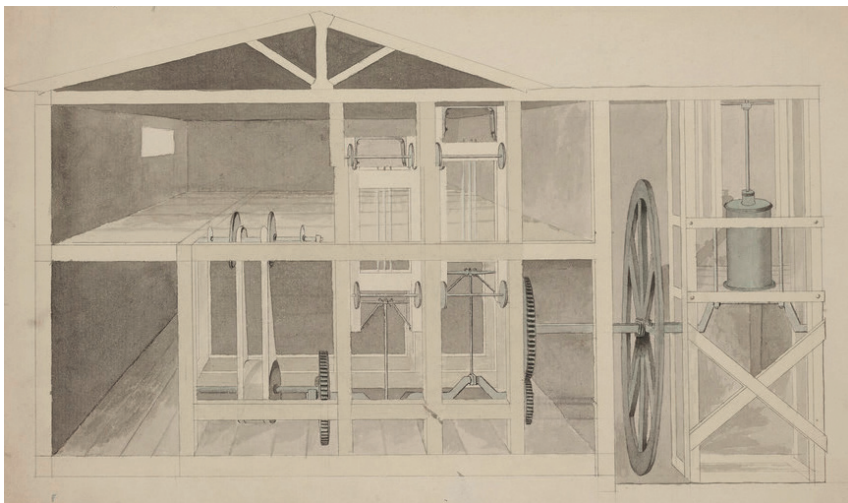


图 10 塞缪尔·边沁设计的多人劳役机械
(伦敦大学学院边沁项目 - 转录边沁, 编号 JB 117/024/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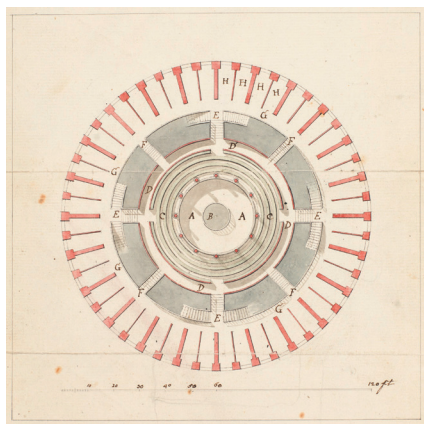


图 11 1791 年全景监狱方案两版平面图^①
(伦敦大学学院边沁项目 - 转录边沁, 编号 JB 119/121/001、JB 119/120/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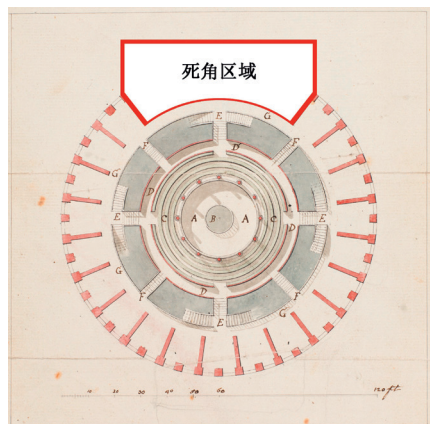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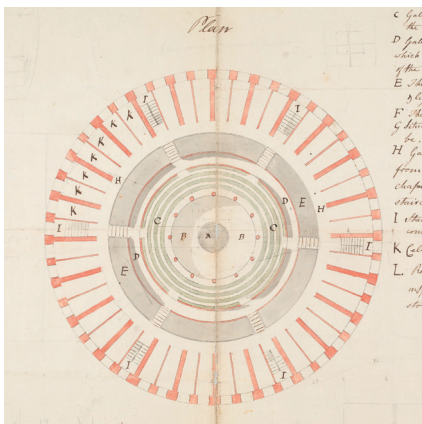


图 12 加入“死角区域”的平面图^②
(作者改绘)

① 牢房与楼梯并未按《后记》描述布置，应该为早期的过程方案。

② 新方案的平面图不仅隐去了死角区域，且仍为单人囚室尺寸，该图增加了死角区域并依照《后记》修改了囚室尺寸。

综上所述,方案的变化并非源于边沁思想的转变,更多的是在外部压力下,为了使方案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而采取的调整。与之相反,边沁依然坚持旧方案中的大部分立场,在图纸妥协于教堂、双人囚室等改动的同时,在写作中表达了与旧方案相近、区别于主流刑罚思想的理念,甚至为还原旧方案的理想结构在图纸中隐去了“死角区域”。

5 小结

诚如森普尔所言,“边沁毕生的思想通常被认为始终如一,他的诸多著作也证实如此”。^[4]初版全景监狱作为监视原理、权力结构的空间化,是边沁理想化构思的原真呈现。而新版方案是在现实环境限制下的建筑方案,尽管在设计图纸上进行了妥协,但边沁对监视原理原真性的追求并未动摇,他在书信和文稿中始终坚持这些原则。以霍华德为代表主流刑罚观念与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尽管在惩罚、教育、卫生环境方面相合,但在宗教感化、人文关怀等基本问题上有着重大分歧。边沁不仅对方案的改动闪烁其词,而且增设的教堂无法实现感化作用,多人囚室反而成为强化劳役的手段,均暗示了变化的被动与抗拒态度。图纸中“死角区域”的隐匿,进一步证实了边沁对监视机制理想模型的追求。因此,并非边沁的思想与立场发生了动摇,而是全景监狱从理想模型到建筑方案性质转换带来的现实问题,以及主流刑罚观念和社会舆论压力,共同引发了方案的变化。

两版方案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将狱卒置于监狱中央的做法虽利于监视,但阻断了狱警对监狱外墙的监视及同外界的联系,并增加了骚乱中的风险。若囚犯行为不端,

狱卒需要经过复杂的走廊、楼梯才能到达事发地,无法及时制止与管束。此外,监视原理对视看空间的需求,必然导致大量空间的浪费。斯特德曼将全景监狱的困境归咎于边沁理想化地将监狱视为一个静态的装置,囚犯待在牢房里,狱警在另一处监视,对他们的行为活动考虑不足。^[2]但其本质上源于圆形平面对监视机制简单粗暴的空间化,由此引发抽象机制与现实需求的矛盾。最终,内政大臣亨利·爱丁顿(Henry Addington)于1813年否决了全景监狱的建设计划。

毫无疑问全景监狱是一个失败的建筑方案,也是一个成功的权力模型。在这种新的权力关系中,控制不再依赖于暴力或物理束缚,而是通过可视性和监控实现。建筑成为权力的来源与媒介,形成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机制,使得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集中于特定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操纵它,并获得相同的权力效应。这更是一种普适的社会控制模型,福柯断言“全景敞视模式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机体,它的使命就是变成一种普遍功能”。^{[1]233}

本文通过全景监狱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建筑图像在表达设计思想和演变中的复杂性,并指出将建筑图纸置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的必要性。图纸不仅是传达思想的媒介,还是建筑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性工具。这意味着其会受到建筑生产的参与者、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图纸所体现的思想很可能与设计者的初衷存在偏差。因此,图像研究有必要回归特定社会文化语境,借助图像与文本的互动,更好地把握设计者的真实意图。全景监狱的设计方案和设计思想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展示了建筑设计如何与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相互作用,以及这些交互如何影响建筑的最终形态和功能。

参考文献

- [1]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2] BOEVER D. François Jullien's Unexceptional Though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20.
- [3] 朱剑飞. 边沁、福柯、韩非、明清北京权力空间的跨文化讨论[J]. 时代建筑, 2003(2): 104-109.
- [4] SEMPLE J. Bentham's Prison: A Study of the Panopticon Penitentiary[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 EVANS R. The Fabrication of Virtu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6] STEADMAN P. The Contradictions of Jeremy Bentham's Panopticon Penitentiary[J]. Journal of Bentham Studies, 2007(9):1-31.
- [7] STEADMAN P. Samuel Bentham's Panopticon[J]. Journal of Bentham Studies, 2012, 14(1):1-30.
- [8] BENTHAM J. 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House[M]. London: T. Payne, 1791.
- [9] EVANS R. Bentham's panopticon: An incident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chitecture[J].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Quarterly, 1971(3): 21-37.
- [10] BENTHAM J. Panopticon: Postscript Part I [M]. London: T. Payne, 1791.
- [11] HOWARD J. 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M]. 4th ed. London: J. Johnson, C. Dilly, and T. Cadell, 1792.
- [12] HOWARD J. 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M]. London: William Eyres, 1777.
- [13] 边沁.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 时殷弘,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14] PICKERING D. The Statutes at Large: From the Magna Charta to the End of the Eleventh 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 Anno 1761 (continued to 1807): Vol XXXII. [M]. London: John Archdeacon, 1778.
- [15] BENTHAM J. Panopticon: Postscript Part II [M]. London: T. Payne, 1791.
- [16] HOWARD J. An Account of the Principal Lazarettos in Europe[M]. London: J. Johnson, C. Dilly, and T. Cadell, 1791.
- [17] BENTHAM J. The Correspondence of Jeremy Bentham, Volume 4[M]. London: UCL Press, 2017.